

第一编

改革总论

——改革是纲 纲举目张

思想撷英

“两个彻底决裂”：与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彻底决裂，与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的观念和理论彻底决裂。

“两个难度更大”：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难度更大；建立符合国情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比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难度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容不得半点天真和浪漫。

改革的过程就是国家一系列改革决策的“串联”和“并联”过程。“串联”得不合理，则会增大改革的阻抗；“并联”得不合理，则会使社会的负荷超载，酿成事故。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老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而要驾着科学之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

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不能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像中医那样进行全面的辨证施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底线：就经济体制方面看，其底线是不搞“全盘私有化”，在这一底线上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就政治方面来讲，其底线是不搞“全盘西化”，在这一底线上推行政治民主。

对于理性的领导者、政治家、思想家来说，要“下热上冷，下冷上热”，对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热潮要科学理智有序地引导。

改革进行二十多年来，该“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是啃“骨头”、攻坚战，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大毅力、更高的智慧进行新的突破。

21 世纪要确保改革开放稳操胜券，必须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迈进。

摒弃十种“左”的经济体制观念^{*}

【内容提要】作者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就着眼于分析和清理“左”的思想观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者就写了这篇文稿，从十个方面分析和清理了在经济体制方面“左”的观念。作者指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胜利，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来一个革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与旧的经济体制彻底决裂，与旧的观念和理论彻底决裂。本文并不是作者关于改革研究最早的论文，但编本书时却列入第一编第一篇，寓意非常深刻。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

^{*} 本文写于1984年10月23日载《经济学周报》1984年12月3日。《社会科学评论》、《干部学习资料》等多种刊物转载。

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 1957 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影响。若干“固定观念”和“‘左’倾错误”是指哪些内容呢？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又有哪些具体反映和表现呢？我理解，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左”的、固定的模式观念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范畴，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残存物，要加以限制和逐步取消。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消费资料才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是商品“外壳”，因此，不能进入流通。

第二，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允许价值规律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只能调节流通，不能调节生产。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要加以限制和逐步取消。

第三，认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只允许国家市场的存在，不允许其他市场的存在，也不允许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存在。

第四，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竞赛，不能有竞争。

第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完全的、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其他经济成分都是与公有制经济不相容的。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优越。

第六，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一切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经营权力都要集中在国家手中，混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和企业经营经济的职能。只承认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不承认国家和企业的分权，不是把企业看做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的经济实体，而是当做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权力集中的程度越高越优越。

第七，认为指令性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惟一形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都不属于计划经济的范围。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中，指令性计划越宽越多越细越优越。

第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应由国家全部包起来。自谋职业、合同工、临时工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范畴。对职工的辞退、除名、解雇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包得越大越彻底越优越。

第九，认为只有行政手段才是社会主义管理经济的惟一手段和最优手段。经济手段都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行政手段使用得越多、经济手段使用得越少越优越。

第十，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资料的分配，主要应遵循“公平”、“平等”的原则，分配的差距越小、平均的程度越高越优越。

以上“左”的、固定的模式观念，多年来一直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占统治地位，也是我们评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标准。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虽进行过好几次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这些改革都是在上述“左”的、固定的模式观念的指导和制约下进行的，因此，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还会越来越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虽然是初步的、探索性的，但是由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了以上“左”的、固定的经济体制模式观念，所以，短短几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后，我们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更大胜利，必须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思想武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来一个彻底革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与旧的经济体制彻底决裂，与旧的观念和理论彻底决裂。

争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内容提要】作者借在西北大学研究生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之机，以饱满的热情赞颂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清理了部分青年学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两种消极认识：“与己无关论”和“改革危险论”。呼吁有志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历史洪流中去，争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历代青年崇尚的一句名言。当今中国，兴亡何在？就在于振兴中华，而振兴中华维系于经济体制改革。当代青年，责任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每个青年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国家经济体制要改革，我们研究生怎么办？我们应该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历史洪流中去，争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 本文是 1984 年 10 月在西北大学研究生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稿，原题为《研究生要争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载西北大学研究生会会刊《开拓纵横》1985 年第 1 期。

在研究生中，绝大多数同学是坚决拥护和积极参与改革的，但是，在部分同学中还存在着一些糊涂的甚至消极的认识：

一种是“与己无关论”。例如，有少数理工科同学认为，改革是文科同学的事，理工科同学成天泡在试验室里，与自己无关；在文科同学中，也有少数同学觉得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学专业同学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我们说，此论差矣！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它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我们每个研究生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主线，但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它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一个配套成龙的系统，各个领域、各个子系统都是互相联结、互相制约的，离开任何一个领域或一个子系统的改革，整个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我们每一个研究生，无论是现在或将来，不是生活和工作在这个领域，就是生活和工作在那个领域，不可能处在改革之外的“世外桃源”中。

我们的同学，有哪一位不想将来生活、工作得更美好一些！而美好的未来是要通过改革实现的，而不是上帝恩赐的。

你不是想要成才么？只有改革才能为人才的成长开辟康庄大道。想过去，有多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夭折、被埋没，这就是我们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和悲剧，而我们要避免这些恶果和悲剧的重演，就必须进行改革。

你不是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就么？但是，如果体制不改革，盘根错节的体制弊端陷住你的手脚，低劣的条件使你无用武之地，你的作用怎么发挥呢？又怎么谈得上更大的成就呢？你不是叹息我国研究生收入太低么？然而，如果经济体制不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得不到迅速发展，就不可能改变我们收入太低的情况。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对我们不是与己无关，而是息息相关，对改革抱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是“改革危险论”。有的同学说，改革是一场危险的行动，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商鞅被车裂，到唐朝二王八司马被贬谪；从北宋王安石罢相，到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都说明改革家没有好下场，为了自己“安全第一”，还是远离改革为好。我们说，亲爱的同学，请你不要把历史作简单的类比，怎么能把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改革和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相提并论呢？那个时代，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总代表——“天子”当政实行封建专制的时代，改革从总体上只能代表封建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但是，改革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封建时代志士仁人的改革家，难免或在某方面触犯天子龙颜，或触犯封建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我国封建时代起稳定结构的情性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皇帝的个人意志和喜怒哀乐，都可能导致改革夭折和改革家的失败。我们现在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和封建时代的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时代改革失败的悲剧是不会重演的，因为时代不同了，基础和条件不同了。

或许有的同学会说，解放以后，不是也有不少具有改革思想和改革精神的人横遭磨难么？我们也不能把解放以后的年代与现在作简单的类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们党曾犯过“左”的错误，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党从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了或正在肃清“左”的错误和流毒，党中央领导集团改革的意志是统一的、坚决的，改革的部署和措施也是审慎的。改革家是受到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保护的。过去那种“左”的错误所酿成的悲剧和不幸是不会重现的。

当然，像这样深度和广度的改革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改革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必然王国”，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改革也可能出现失误和偏差。但是，这些都是局部的、非本质、非主流的。我们改革的总趋势是必定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王国”正在被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正在被我们不断揭示，“摸着石头过河”必将变为驾着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我们的改革必将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丰硕成果。

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我们 80 年代的研究生，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操的青年，固然，我们要关心个人的事业、前途、幸福和安危；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心祖国

和人民的昌盛、发展、前途和幸福。我们的道德情操要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即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之上。只有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需要、利益和幸福为己任，才会自觉地、积极地投身改革。被誉为“知识贵族”的研究生，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去研究改革，探索改革，促进改革，为改革做出贡献。只有这样，自己的全部能量和光芒才会充分地放射出来。我们的研究生各自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不同，每个人的自我设计和选择的长远目标各异，我们之中将来有的可能成为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有的也可能成为政治家、理论家。但是，我们都生活在改革的伟大时代，改革的伟大事业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但愿我们都成卓有成效的改革家。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演变和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其经验教训^{*}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几次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矛盾”和“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恶性循环的体制根源，在于过去的调整 and 改革都局限于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的划分，而没有解决赋予企业本身以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难度更大”：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难度更大；建立符合国情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比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难度更大。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解放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立起来的。三十多年来，它的形成、演变和改革，

^{*} 写于 1984 年 11 月 载《经济改革》1985 年创刊号。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和初步形成时期。从 1950 年到 1952 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党中央从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出发，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实行了国营经济控制下的市场调节。这种经济体制，凭借国营经济的实力和国家政权的支持，在社会大变更的初期，有效地控制了国民经济全局，成功地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增长。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我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时期，我们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模式，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逐步向国营和集体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

第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迅速实现了从地方分散管理体制向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转变；

第三，在国家与劳动者个人的关系上，从多种渠道就业，多种计酬形式，逐步向国家统一管理城镇劳动力和统一规定工资制度过渡；

第四，在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上，从国家计划控制与指导下广泛存在的市场调节，逐步向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过渡。

这一系列变革，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过渡

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两大矛盾：

一是中央条条管理为主，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一切权限掌握在国家手中，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然，应该肯定，当时建立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当时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而且，当时也并没有把一切全部统死。民族工商业者还存在，还拿定息，企业还可以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国营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也刚刚形成，还没有分割全部企业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没有实行“公社化”，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活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制度转轨中，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贡献精神、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比较高。由于这些因素，抵消了一些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的消极作用，使得当时的经济发展还比较顺利，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不仅按计划完成了以 156 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任务，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逐

步显露出来。

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改进措施。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说，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②同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在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经济体制的设想，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 页。

②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 1956 年《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这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6 页。